

砥砺前行： 新加坡作家协会的发展之路

张森林

一、前言

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诞生了难以计数的全国性和地方性文学团体，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和语丝社数个。新加坡华文文学起源于中国现代文学，新加坡华人在很早以前就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鲁迅、茅盾、巴金和郭沫若等作家的作品便在新加坡华校广泛传播。1920年代中期，新加坡出现了第一个文学运动，那就是盛极一时的“新兴文学运动”。事实上，它是当时中国太阳社的蒋光慈和创造社的郭沫若等人发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延续。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是革命作家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下发起和展开的，它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生活，并为无产阶级服务；这个运动在中国展开后，左翼文学的理论或论述分别由当时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如永刚、许杰、罗依夫、杨实夫、衣虹、张楚琨和胡愈之等人带来新马文坛。鲁迅《呐喊》和《彷徨》，郭沫若《女神》和《星空》，蒋光慈《新梦》和《鸭绿江上》，茅盾《子夜》、《蚀》和《林家铺

子》，巴金《家》、《春》和《秋》，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田间、臧克家、艾青、冯雪峰和曹禺等作家的带着革命意识和改造社会理想的作品，都是深深影响新马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根据新加坡作家陈剑的观察：“他们的作品一直被采用作华文课本的教材¹，新马华文作家可说都是在中国新文学浸润下成长的，左联作家以及延安艺术作品的唯物文艺观、无产阶级文学论点在影响着新马左翼华文文学。”²

1、1970年之前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团体简况

由于这种密切的语文、文学与文化接受关系，新加坡华文作家很早就已经知道各个中国现代文学团体的存在，但

¹ 对于陈剑的这个观察，自幼在新加坡接受华文教育的笔者深有同感。在新加坡初高中的华文科课本中，鲁迅、巴金、茅盾、郭沫若、老舍和曹禺等人的作品一直是必修课文。马来西亚学者潘碧华所做的一些统计数字也可印证陈剑的这个观察：“从50年代末到90年代大约40年的时间内，马来西亚中学华文课本采用了170位现代文学作家300多篇的作品。其中最为流行，广为各中学（包括国中和独中）所采用的华文课本是马来西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华文》。选用的白话文散文和诗歌计有107篇，作者56位，包括包公毅、冰心、蔡元培、陈衡哲、陈兼善、陈纪莹、陈之藩、陈醉云、丁西林、董作宾、丰子恺、甘绩瑞、顾颉刚、胡适、老舍、梁启超、林良、刘大白、吕梦周、罗家伦、朱光潜、朱湘、朱自清、宗白华等。”见潘碧华〈疏离与沿袭：马华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研究〉，2010年10月《学术论文网》，网址：<http://www.csscipaper.com/literature/waiguowenxuepinglun/115665.html>。

² 陈剑〈建国前后的新华左翼文学运动概要〉，2010年10月《随笔南洋网》，网址：http://www.sgwritings.com/724/viewspace_5797.html。

是，根据笔者所掌握的不完整资料，新加坡华文文学团体的历史，最早只可以追溯至1939年4月15日，由诗人刘思、姚木和蕴郎等人发起的诗歌组织“吼社”。他们开展“诗歌大众化运动”，在《总汇报》副刊《文会》的园地办“大众诗歌专页”，认为诗歌“已经不是文人吟风弄月的玩意儿，不是艺术之宫里的象牙，它成为了全民族的吼声，它是时代的号角，它是抗战的歌颂者”³。论者认为，“作为一场文学运动，‘诗歌大众化’开展的时间不长，在气势和影响上也有所不足，但它却给抗战时期的新华诗坛，注入了生气和活力。由于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诗歌创作不为人们重视，处于相对冷落的境地，倡导者竟高扬起大众诗歌的旗帜，其胆识的确很不一般”⁴。可以这么说，吼社的成立，纯粹是为了支援中国抗战所需而开展诗歌大众化运动，欠缺比较宏观和长期的发展规划。

1945年二战结束后至1970年期间，曾经有多位作家振臂高呼，号召成立新马华文作家协会。其中两个成功创立了，第一个是成立于1945年9月的“九一社”，后改名为“绿社”，出版《南方文艺》期刊，其后“绿社”的所有成员加入“星华写作人协会”。星华写作人协会在1945年10月15日开始

³ 原载刘思〈问与答〉，1939年9月19日《世纪风·诗歌专页》。引文转引自黄孟文、徐迺翔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年10月），页54-55。

⁴ 原载〈检讨〉，1940年5月20日《文会·大众诗歌专页》。引文转引自黄孟文、徐迺翔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页56。

筹备，12月23日成立，首届执委包括陈曼甦、苗秀、高金、辜石如和萧魂等人，并借《华侨日报》的版位出版期刊，曾举办马华文艺独特性座谈会。第二个是成立于1947年的“星洲青年文艺研究社”，后者曾借《南侨日报》出版《青年周刊》和《学生生活》数十期，以及出版诗集《怒吼吧！新加坡》。1948年，为了有效控制马来半岛日益紧张的政治局势，英国殖民地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宣布马来半岛进入紧急状态，星华写作人协会随之自动解体；《南侨日报》被政府封闭，星洲青年文艺研究社也随着自动解散。⁵

另外三个筹组不成功的团体名称是：1956年年中筹组的“文艺写作者协会”、1959年8月筹组的“马华作家协会”、1967年12月筹组的“星马作家协会”。

新声诗社是成立于1950年代的硕果仅存的一个新华文学团体，但那毕竟只是诗社，而不是综合性的文学团体。

战后新华文艺界之所以数次要组织一个团结合作的团体，却因人事问题或五分钟热度而未能组成，导致文坛呈现一盘散沙的现象。究其导因，黄孟文认为：“门户之见太强，组织能力不足，独来独往的习惯太深，文人相轻的心理在作祟等，都是重要的原因。”⁶ 田流也有同感：因为有关成员的

⁵ 参见黄孟文〈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终于成立了〉，黄孟文《新马文艺论丛》（新加坡：世界书局私人有限公司，1979年9月），页99；田流〈新加坡作家协会成立初期的风风雨雨〉，田流《田流回忆录（第四辑）》（新加坡：天际制作私人有限公司，2005年12月），页66。

⁶ 黄孟文〈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终于成立了〉，黄孟文《新马文艺论丛》，页98。

个别门户之见太深，或为争权夺势，或因组织能力涣散，经济基础薄弱或因注册未获批准等等因素，最终都难免胎死腹中。⁷

早在1950年，新加坡马来文作家协会“五十年代作家行列”（Angkatan Sasterawan '50，简称“ASAS50”，英文译名“Association of '50s Malay Writers”）即已成立，然而，新加坡于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另外三个语文源流：英语、华语和淡米尔语的作家团体还没有成立。1970年年初，新加坡国会在辩论1970年至1971年的财政预算时，一些部长和国会议员也提及成立作家协会的问题。他们大都认为，作家们本身确然应该负起责任，把自己组织起来，加强自己的力量，进而营造良好的读书与写作的风气，以利于文学的发展。⁸

同一个时期，在新社与新加坡大学校外进修系联办的一个颇具规模的文学与艺术座谈会上，发言者之一孟毅（黄孟文）发表了题为〈我国文学的现况及其发展前途〉的谈话。他在谈话中强调：作家们大都有自个儿埋头苦干的倾向，除了少数之外，大部分不大能搞团体工作。如果缺乏一个健全的中心组织，就会形同一盘散沙。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必须团结起来，才能发挥重大的作用。要团结，首先就应该有

⁷ 田流〈新加坡作家协会成立初期的风风雨雨〉，田流《田流回忆录（第四辑）》，页66。

⁸ 叶凌峰〈作家协会何时能够成立？〉，《新社文艺》第13期（1970年3月），页1。

一个完善的组织，有一个中心机构，作为团结的象征。通过这个组织，可以进行各种与文学有关的活动，以提高本地的写作水准，进而联络本国其他语文源流的作家，共同努力。⁹所以，黄孟文认为，成立一个组织完善而又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协会，的确是当务之急。

黄孟文在说这番话之前，已经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再见惠兰的时候》。这番话是当时33岁的他发自内心的真切话语，在往后的二、三十年间，他始终秉持初心，兢兢业业地带领一群有着共同志向的作家向同一个目标迈进。新加坡华文文学、文学团体和作家团结，始终是他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动力。

前述新加坡目前历史最为悠久的文学团体新声诗社成立于1957年，1970年代以来，新华文学团体纷纷成立，一些已经解散，仍然活跃于新华文坛的团体有十余个，包括：新加坡作家协会（下称“作协”）、五月诗社、新加坡文艺研究会（1990年改名为“新加坡文艺协会”）、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锡山艺术中心、全球汉诗总会、异质诗社、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新加坡分会、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创作学会、大士文艺促进会、书写文学协会、南洋诗社、南洋诗会和赤道风文化协会等。这些文学团体秉承自身的创会宗旨，有些创办文艺刊物，出版符合自身优势与审美角度的文学选集和丛

⁹ 同上。

书；有些积极开展各类文学活动，包括朗诵会、研讨会、座谈会、书展和文学创作比赛；有些则展现在文学出版与文学沙龙上的双重实力，在这两个层面上皆有所建树。无论他们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在创作新加坡国家文学的过程中，他们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2、文献回顾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团体研究是文学史研究的一部分，然而，在关于新加坡华文文学史书写与文学研究中，文学团体始终处于边缘地位。1999年，中国学者陈贤茂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¹⁰ 的第一卷，只有陈贤茂所写的〈五月诗社的艺术追求〉一文是属于新加坡文学团体研究的范畴。2002年，黄孟文与中国学者徐迺翔联合主编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主要涵盖不同时期的作家的简介与作品的分析、文艺思潮与文艺论争的阐述与总结等，在第五章“新加坡共和国初期的华文文学”辟有一节“文学团体的涌现”，介绍新加坡独立后比较活跃的华文文学团体。2015年，王润华、蔡志礼、许通元、李金生和曾繁靖主编的《新加坡华文文学五十年》¹¹ 一书中，许通元和曾繁靖整理汇编

¹⁰ 陈贤茂主编《海外文学文学史·第一卷》（厦门：鹭江出版社，1999年8月）。

¹¹ 王润华、蔡志礼、许通元、李金生、曾繁靖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五十年》（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5年12月）。

的〈新加坡华文文学社团50年〉，也有撰文介绍新华文学团体。

在目前新加坡的十余个华文文学团体中，成立于1978年10月的五月诗社是备受探讨的一个，就笔者手头上所掌握的资料显示，除了陈贤茂〈五月诗社的艺术追求〉之外，至今有九篇论文是以这个团体作为研究对象：

- 胡凌芝〈有水的地方就有舟，有岸的地方就有歌——《五月诗刊》巡礼〉¹²；
- 朱立立〈论新加坡五月诗人的诗歌创作〉¹³；
- 李瑞腾〈新加坡五月诗社的发展历程〉¹⁴；
- 黄蕙心〈论五月诗社的发展及其在新华诗歌史上的地位〉¹⁵；
- 肖恠〈回归传统，感悟现代——论新加坡五月诗人的诗歌创作〉¹⁶；

¹² 胡凌芝〈有水的地方就有舟，有岸的地方就有歌——《五月诗刊》巡礼〉，《华文文学》（1988年第1期）。

¹³ 朱立立〈论新加坡五月诗人的诗歌创作〉，《华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¹⁴ 李瑞腾〈新加坡五月诗社的发展历程〉，《五月诗刊》第30期（1998年12月）。

¹⁵ 黄蕙心〈论五月诗社的发展及其在新华诗歌史上的地位〉，新加坡国立大学2002年学士论文。

¹⁶ 肖恠〈回归传统，感悟现代——论新加坡五月诗人的诗歌创作〉，《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年第4期）。

- 宋红梅〈论新加坡五月诗社创作风格之演变〉¹⁷；
- 宋红梅、翁奕波〈庸常生活审美化：现代派诗的本体依归——新加坡五月诗社后期创作审美取向论析〉¹⁸；
- 陈涵平〈五月诗花次第开——新加坡“五月诗社”代表作解读〉¹⁹；
- 伍木〈五月抒情人文诗学的实践——《五月诗选三十家》导言〉²⁰。

在这些文章中，黄蕙心〈论五月诗社的发展及其在新华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宋红梅〈论新加坡五月诗社创作风格之演变〉都是学位论文。黄蕙心文和李瑞腾〈新加坡五月诗社的发展历程〉梳理了五月诗社的发展历史和在新华诗坛的地位。另外几篇的重点都是在于从整体上爬梳五月诗人的诗作的主要思想内容，以及探讨他们的美学取向。总的来说，五月诗人以怀抱中华文化为主的创作内涵和现代主义创作手法，是评论家所关注和探究的对象。

¹⁷ 宋红梅〈论新加坡五月诗社创作风格之演变〉，汕头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

¹⁸ 宋红梅、翁奕波〈庸常生活审美化：现代派诗的本体依归——新加坡五月诗社后期创作审美取向论析〉，《新华文学》第75期（2011年7月）。

¹⁹ 陈涵平〈五月诗花次第开——新加坡“五月诗社”代表作解读〉，《名作欣赏》（2013年第30期）。

²⁰ 伍木〈五月抒情人文诗学的实践——《五月诗选三十家》导言〉，郭永秀、伍木主编《五月诗选三十家》（新加坡：五月诗社，2017年9月）。

以作协为主体的研究论文有刘桂兰〈从《文学》到《新华文学》——探讨新加坡华文文学的本土意识〉²¹，研究作协刊物《文学半年刊》和《新华文学》上所发表的作品本土意识；王兵主编《品读新华文学·第一辑》²²，收入以这两本作协刊物发表的作品为分析对象的22篇评论。与作协有关的史料文章并不匮乏，主要集中在黄孟文《新马文艺论丛》、田流主编《新加坡作家协会成立廿一周年纪念特刊》²³、黄孟文编《新加坡作家协会手册》²⁴、王润华编《新加坡作家协会·新纪元2000》²⁵、田流《田流回忆录（第四辑）》、陈华淑主编《新加坡作家协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²⁶等六本书刊中。林琼〈结缘《文学》的始末——文林旧事〉²⁷也是史料之一。以作协为采访对象的访问稿，则有张曦娜〈作家从此有

²¹ 刘桂兰〈从《文学》到《新华文学》——探讨新加坡华文文学的本土意识〉，北京师范大学2004年学士论文，见李选楼编《新马华文作家作品论集（二）》（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06年9月）。

²² 王兵主编《品读新华文学·第一辑》（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6年7月）。

²³ 田流主编《新加坡作家协会成立廿一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作家协会，1991年9月）。

²⁴ 黄孟文编《新加坡作家协会手册》（新加坡：新加坡作家协会，1997年1月）。

²⁵ 王润华编《新加坡作家协会·新纪元2000》（新加坡：新加坡作家协会，2000年5月）。

²⁶ 陈华淑主编《新加坡作家协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作家协会，2010年10月）。

²⁷ 林琼〈结缘《文学》的始末——文林旧事〉，《新华文学》第66期（2006年12月）。

自己的家》²⁸ 和顾楠楠〈文学的传承与创新——访华族文化贡献奖团体奖得主新加坡作家协会〉²⁹ 等。

至于有关其他文学团体的学术论文，只有许秀环〈南洋大学诗社研究〉³⁰ 等。不过，有些论文虽然是以文学团体领导人作为研究对象，但实质上内容却多环绕在研究对象的所属团体成绩上，例如邱爱雯〈骆明推动新华文学方面的贡献〉³¹，论文题目是关于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骆明对于新华文学的贡献，实则文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在总结归纳新加坡文艺协会推行的会务对新华文学的贡献。

2017年2月12日，在书写文学协会主办的《书写文学》创刊号发布会上，有一场题为“新时代的华文文学团体在新加坡所能扮演的角色”的座谈会，参与者是该协会的四位会务顾问：陈志锐、张松建、希尼尔和伍木。相信这是新加坡第一次以文学团体作为课题的座谈会，伍木在座谈会上以〈新加坡八个华文文学团体的成立章程及简介〉为题，介绍了八个新华文学团体：吼社、作协、新加坡文艺协会、五月

²⁸ 张曦娜〈作家从此有自己的家〉，2000年5月4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²⁹ 顾楠楠〈文学的传承与创新——访华族文化贡献奖团体奖得主新加坡作家协会〉，《源》第134期（2018年8月）。

³⁰ 许秀环〈南洋大学诗社研究〉，南洋理工大学2009年学士论文。

³¹ 邱爱雯〈骆明推动新华文学方面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2007年学士论文，见骆明主编《新华文学评论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10年9月）。

诗社、锡山文艺中心、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创作学会、大士文艺促进会 and 书写文学协会。

众所周知，每个社团的成立都会有其特定的宗旨，而该社团所能够达致的成绩，必须与其创会宗旨联系起来看，并且，不同社团的成绩维系于其领导者的能力、兴趣与会务方向。2018年5月，作协获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颁发第二届新加坡华族文化贡献奖（团体组），全体理事和会员为之鼓舞。评审委员会主席刘太格表示：“经过这两年的筛选，我是深深地感受到，新加坡的华族文化活动比我过去的理解更活跃得多。希望下一代会努力地从事于这种文化活动。”³² 作协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的新加坡文化团体中脱颖而出，获得这个奖项，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考察，一是作协所组织的活动与外部的社会脉络的相互联系，例如配合新加坡的双文化国策、对建国文学的号召的响应、亚细安协作活动、新加坡与中国建交所带来的机遇等等；二是作协内部的创会宗旨、协会结构、理事会成员与活动方向。

本书从上述内外两个层面出发，结合作协的发展之路，梳理作协对新加坡华族文化所做的贡献，探讨其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因素。笔者把作协在不同时期的成长轨迹和发展阶段划分为四个时期，即：草创期（1970年至1975年）、奠基期

³² 李贻谊〈85岁资深音乐家获颁第二届新加坡华族文化贡献奖〉，2018年5月18日新传媒《8频道》新闻。

（1976年至1986年）、发展期（1987年至2015年）和转型期（2016年至2020年），并逐期概述分析。

一般上，文学创作的发展、文学机构的分期，有其内在的诱因和外在的导因。第一个时期（1970年至1975年）之所以会命名为“草创期”，主要是因为在这五年间，作协处于开始磨合的阶段，在作协成立之前，没有其他成功的综合性华文文学团体的模式可以依循，由一帮成名作家组成的理事会，形成有将无兵的局面，这些理事，并非每个都是上下同心的，有者甚至认为自己不是作家，难以担负作协理事的重任。此外，作协召集人连士升没有在第一屆理事会选举时担任要务，秘书黄孟文在作协成立不久后就远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课程，作协理事会缺乏一两个能够挑大梁的主心骨，对初生的作协的会务发展而言无疑是一大限制。

第二个时期（1976年至1986年）之所以会命名为“奠基期”，是因为届时黄孟文已经从美国学成归来，在他破釜沉舟的决心下，在一帮热心做事的新理事会成员的集思广益下，协会改名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会务渐渐走上轨道。在这十年间，担任作协会长的黄孟文先后获得周粲、杜红、王润华和田流等副会长的鼎力协助，理事们经过先前的一番磨合，这个时期的契合度较高，大家各自发挥所长，不只会员人数大增，本土华文媒体也愿意与之密切配合，联合推出各项文学活动，奠定了作协在新加坡国内与国际的知名度。

第三个时期（1987年至2015年）之所以命名为“发展期”，是因为在这28年间，在王润华、黄孟文与希尼尔先后担任作协会长的情况下，作协的会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静态的文学作品出版与动态的文艺活动组织，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达到了一个令人比较满意的层面。王润华和希尼尔在黄孟文领导前期理事会成员打下一个稳定局面的基础上，不断在会务上推陈出新，尤其是王润华，他接任会长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作协复名为“新加坡作家协会”。此外，由于他当时身在学术界，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与人脉关系，在他两度担任作协会长期间，便组织了数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他离任会长职位之前，也成功地栽培了作协领导班子，确保在后王润华时代，作协的会务仍然能够向前推进。如果说之前十年是作协步步为营、稳扎稳定的奠定期，那么，这28年就是作协信心满满、展翅高飞的腾飞期，

第四个时期（2016年至2020年）之所以会命名为“转型期”，主要是因为接任会长职位的林得楠充满新颖构想。2018年5月18日，在第二届新加坡华族文化贡献奖的颁奖礼上，林得楠在接受新传媒《8频道》记者李赠谊采访时透露：“作协除了进驻校园培养下一代写作人，接下来也将继续与国内外文化团体合作，以跨界的形式推展新华文学。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把文字这个静态的东西，用动态的方式推广出去。所以我们会考虑多一点跨界的合作，包括跟音乐家、音乐团体，

艺术家和画家，用他们的专长跟我们的文学作品结合。”³³从过去四年作协的会务看来，除了文学创作的努力一以贯之外，在文艺活动的组织上，林得楠的表现与前三位作协会长的侧重点确实存在着明显不同。

需要声明的是，本书的撰写并非在于罗列和涵盖作协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活动成绩，而是援引其中一些活动例子作为分析的对象，希望通过这方面的深入探讨与经验总结，能够作为新加坡其他华社的借鉴和参照，从而齐力迈向一个更有组织活力的新加坡社会。

二、新加坡作家协会发展简史

1985年，时任劳工兼交通部长王鼎昌应邀为作协出版的《会员名册》撰写献词之际，曾要求名册主编田流稍微解释作协会徽的意涵。田流即刻以图文诠释，同时发表在名册内。作协会徽呈白底黑色，释义如下：

三个圆圈代表着许多小团结汇成一个大团结，笔尖指向圆心，象征着写作界的百派归宗，含有提醒华文写作者“不忘根本”的寓意。黑色图案则象征严肃、端庄与公正。

³³ 李赠谊〈85岁资深音乐家获颁第二届新加坡华族文化贡献奖〉，2018年5月18日新传媒《8频道》新闻。